长征中领导中枢的三次转变

■褚 银

军史撷珍

长征，不只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中，党和红军先后出现三个被称为“三人团”的组织：长征前夕成立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以及遵义会议后成立的“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透过这一变化，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何正视并解决问题，从而绝处逢生。

一

1934年4月底，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苏区形势日趋恶化，人力、物力消耗巨大。5月初，李德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了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在计划中提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方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李德拟定的计划。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绝大多数委员，原则上都同意突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通过在上海的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二是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6日，共产国际复电，表示“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同时复电提醒，中央苏区仍具备继续坚持斗争的条件，应当一边继续作战，一边为主力撤离做好准备。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当时，“三人团”虽属临时性组织，实际上统一指挥苏区的所有事务，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没有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直至长征初期，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正如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战略，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红军又遭受严重损失，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

从通道会议起，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开始逐步削弱。直到遵义会议，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完全排除了李德的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使军队的领导和指挥重新回到正确轨道。

二

按照最高“三人团”原来的打算，是要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的，后因毛泽东、张闻天有异议，才让他们留在总部。这样，张闻天就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与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它不是经中央正式决定成立的机构，而是在同错误路线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政治组合。

由于对不少问题看法比较接近，以及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张闻天同毛泽东渐渐走到一起。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再到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一再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打击。自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博古产生了分歧，导致张闻天在组织上也受到排挤。眼看反“围剿”战争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根据地。他们心中都有抑郁、愤懑之情。出发前有一天，张闻天同毛泽东坐在云山古寺前一棵黄槲树下的石凳上聊天。张闻天把心中的不快都向毛泽东谈了出来，两人进行了坦诚的谈心。

踏上突围西征的路程时，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那时毛、王二人，一病一伤。毛泽东身患的恶性疟疾刚被控制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二人都躺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这种特定环境，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有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讨论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上。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重兵，设置四道封锁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毛泽东首先争取了王稼祥。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种种忧虑。毛泽东结合实际情况，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王稼祥更加坚定了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决心。随后，王稼祥又找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黎平会议后，在到达离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首先向毛泽东提议：这样下去不行，应当开个会总结经验，把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同意王稼祥的提议，主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中央队三人团”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议对军事指挥作出改变：“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受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在毛泽东提议下，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中央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但前敌司令部不能自主决定作战行动。

3月10日，红一军团领导致电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随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发动“打鼓新场战斗”问题。到会的大多数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并表示如坚持进攻，他将辞去前敌政治委员一职。张闻天主持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一般原则作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担任没几天的新职因此被撤销。散会后，毛泽东实在放心不下，深感攻打打鼓新场极为不利，会给红军造成损失。于是，毛泽东夜里提着马灯，又去找周恩来谈，要他把进攻的命令晚一点发，再想一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清晨，中央再次开会讨论，最终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

这件事使毛泽东感到，指挥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应该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毛泽东提议，3月11日，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

周恩来后来回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陈云也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军事小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中记述：“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

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3月成立到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自行取消，前后存在了3个月时间，时间虽短，但它在长征史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到“中央队三人团”，再到“新三人团”，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自我纠错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自我纠错，使红军摆脱了错误军事路线的束缚，在惊心动魄的行军作战中重新赢得主动，最终走出绝境、走向胜利。

图文军史馆

红军钟

■杨舒国臣

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红军长征陈列馆的展柜里，有一口老式座钟。漆面因岁月流逝略显斑驳，钟体被擦拭得洁净光亮。这件被当地群众亲切唤作“红军钟”的文物，背后藏着一段红色往事，镌刻着长征路上人民军队与群众的鱼水深情。

1935年4月，中央红军主力转战黔西南。18日傍晚，红三、红五军团及军委纵队进驻贞丰县城。入城之初，红军部队严格执行革命纪律，不进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红军官兵还在县城田坝街、场坝等醒目位置书写“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天下穷苦人是一家”等标语，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放粮，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着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初心。

红军的一言一行，深深打动了贞丰县城的贫苦百姓。大家从最初的观望、疑虑，转变为发自内心的信任与亲近。县城里的回族同胞马老太，正是这群淳朴百姓中的一员。

参加完群众大会后，马老太了解到，当地能够安置伤员的地方十分有限，还有一名腿部中弹的红军战士暂时没有被安置。马老太心里清楚，如果收留红军伤员，一旦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因为亲眼见证了红军真心为民的所作所为，她决定收留这名受伤的战士。

到家后，马老太烧来热水为战士烫脚驱寒，用淡盐水仔细清洗溃烂的伤口，又连夜上山，采来专治跌打损伤的草药，捣碎后敷在伤处。在她的悉心照料下，那名战士的伤势一天天好转起来。

很快，部队开拔的日子到了。战士感念马老太的救命之恩，取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银元，塞给老人当作谢礼。马老太连连摆手拒绝。她指着院墙上红军写的标语，说：“你们都说天下穷苦人是一家，自家人哪有收钱的道理？”

战士实在无以为报，思索片刻后，从贴身的行军包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口座钟，双手递到马老太面前。他告诉老人，这口座钟是自己离家参军时，爹娘给他的，长征路上也一直带在身边。“老人家，您不肯收银元，这口座钟就留给您做个纪念吧。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看您。”

红军战士走了，座钟留在了马老太家中。此后40余载，马老太小心珍藏座钟，经常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故事。在她弥留之际，特意将座钟交到大儿子马文华手中，反复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保管。

1985年5月16日，马文华遵照母亲的遗愿，将座钟捐赠给贞丰县文物管理所。这段军民佳话，也由此走入公众视野。

一口座钟，两代守护，它既是红军严守群众纪律、始终一心为民的历史见证，也是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人民军队的生动缩影。



红军钟。 作者提供

难忘的会师

■郑维山

亲历者讲述

1936年3月中旬，我们红三十军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甘孜地区。不久，就传来了“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快要进到西康啦”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在当时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和紧张战斗的岁月里，还有什么能比红军两大主力相会合更令人感到兴奋和激动呢？对我们这些曾亲身经历过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欢乐和分离之苦的人来说，就更懂得再次和兄弟部队会师的珍贵。

红四方面军总部向部队进行了有关会师的政治动员。各部队按徐向前总指挥的要求，立即行动，以各种不同方式，满腔热情地进行着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各项准备工作。

5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李先念政委和程世才军长从总部回来后，找到我说：“郑维山同志，根据总部的命令，有一件重要任务交给你们完成。”李先念政委当时显得格外兴奋，接着说：“红六军团已经进入稻城一带。由你带265团进驻西边的绒坝岔地区。你们的任务：一是掩护主力在甘孜地区休整；二是宣传动员群众，筹粮筹款，做好北上的物质准备；三是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

“什么，迎接红二、红六军团？”李政委话音刚落，我又高兴地问了一句。当时那种激动劲儿真是无法形容。我感到十分自豪和光荣，信心百倍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要把这次会师搞得更好，让红军永远团结，永不分离！”李政委和程军长目光含着期望，满意地笑了。

我向265团进行了简短动员后，大家欢欣鼓舞地开向绒坝岔。

从甘孜出发西行约70里，很快就到达绒坝岔。这里是甘孜管辖的一个重镇，四周地形开阔，是一片茫茫的大草原，夹有一些丘陵起伏地。镇子就坐落在起伏地的低洼处。居民大都是藏族牧民，只有少数汉人，后来都成为红军的通司。由于长期以来，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加上当地一个国民党反动派保安团的威胁，我们到达后，镇子里已空空如也，一个老乡也看不到。

部队住下后，我和营、团干部立即研究筹粮等问题。大家认为，只要先把群众找回来，就会有办法。我们决定，首先派出武装宣传队外出宣传，动员群众回来。宣传队在绒坝岔南面的一个山沟里，发现了一个国民党保安团，有百八十人，平时打家劫舍，欺压藏胞，无恶不作。

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即派出2个连的兵力，两路包抄，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我们从保安团那里缴获了不少罐头、酒及虾皮、木耳、鱿鱼等山珍海味。有些东西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可是谁也没有私自留下一点。缴获这些东西的连队把它们原封不动地交到营里，营里又全部送到团部珍藏起来，都说要留给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友们。我望着这么多日来忍饥受饿、面黄肌瘦，捧着山珍海味却不肯吃一口、仍旧以野菜充饥的战友，眼眶湿润了。难道还有比战争年代革命战友之间这种感情更纯洁、更珍贵的吗？

我们一举歼灭了那个国民党保安团后，宣传队的同志通过通司反复喊话，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工人农民及各族人民自己的队伍，这个队伍专门打国民党反动派和欺压人民的反动军阀；红军和藏胞是一家人，不会白拿藏胞的东西。有几位年长的藏民带着试探心情首先回到镇子上。他们回到家，看到红军部队确实纪律严明，一切东西完好无缺，态度和蔼的红军战士还给他们端水端饭。他们说：“大家不知道还有你们这么好的队伍。这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他们连夜赶到藏胞躲藏的山沟里，介绍红军的这些实际行动，并做动员解释。第二天，藏胞们便三三两两地陆续回来了。

在藏胞的支持、协助下，我们很快就筹集购买了一批牛羊和羊毛等物，制作了不少牛羊肉干，以备两支红军会师后北上途中之需。有了羊毛，我们就发动大家人人动手捻线，打毛衣、毛袜子。大家积极性很高，从干部到战士每人至少都打了两件毛衣，一件自己穿，另一件作为同红二、红六军团战友会师时的见面礼。为了赶在会师前打好毛衣、毛袜，许多同志一连几个晚上不休息，坐在月光或酥油灯下，剪羊毛，捻毛线，一针一针地编织。许多藏胞也纷纷跑来帮我们织，一边织，还一边哼着歌儿。一件件厚实的毛衣、毛袜，渗透着革命战友和兄弟民族同胞的深情厚谊。

在会师喜讯的鼓舞下，干部战士用不着动员，就自觉地开展了工作、学习和练兵的竞赛。那些天，军营内外到处笑语盈盈。五一劳动节那天，部队还在草滩上组织了军事技术表演和文娱体育比赛活动，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同志还用白灰在墙壁上书写了“向英勇善战的红二、六军团学习！”“迎接兄弟的二、六军团，共同北上抗日！”等大字标语。各连都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床上铺着厚厚的青稞草，时刻等待着红二、红六军团战友们的到来。

盼呀，望呀，终于迎来了他们。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在理化同红三十二军会师。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军团，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绒坝岔。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在艰苦的长征中相逢，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

记得那天，风和日丽，草原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指战员们远远望见红二军团的队伍，像条“巨龙”朝着绒坝岔飞腾而来时，便飞也似的奔向前去，抢过战友的行装背在自己的身上，再紧紧地握着手，互相打量着，问候着，叙长道短，格外亲切。许多藏族同胞也簇拥路旁，捧着酥油糌粑夹道欢迎，口里还不住赞叹：“耶莫！耶莫！”（顶呱呱的意思）到了宿营地，炊事班同志立即打来热气腾腾的开水，让战友洗脚解乏。有的战士看到红二军团战友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不等我们统一安排，就先拿出亲手打好的毛衣、毛袜，让战友们赶快换上。

往日寂静的绒坝岔沸腾了，处处洋溢着欢笑声，回响着嘹亮的歌声。大家又唱起了同中央红军会师时学会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哎！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向前进！”

为欢迎远道而来的贺龙、任弼时等首长和红二军团的同志们，我们在会师的第二天中午举办了一次会师宴。早晨起床后，我亲自到伙房吩咐：“把从保安团那里缴获的好东西都拿出来，给首长和同志们接风！”

入席后，贺老总首先举杯笑着说：“这些东西，你们没舍得吃，拿来招待我们。来，让我们干杯，共庆胜利！”一句话表达了我们的心声，说得大家心花怒放。

分别时，贺老总亲切地对我说：“郑维山同志，谢谢你们的盛情招待。我们会合了，就要北上，革命一定要发展到最后胜利才算完！”

（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88师政治委员。文章摘编自《来时的路：亲历者讲述红色故事》，有删节）

走过长征路的“两国将军”

■王正帅

人 物

“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过无数人的帮助。对于这些人，我们不应该忘记。”萧克晚年曾这样回忆长征路上同行的外国人。在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一位越南籍的革命者——洪水。他是新中国开国将领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和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他的中文名字“洪水”，见证了他的革命初心。

洪水，原名武元博。青年时期，受越南革命先驱胡志明影响，武元博远赴广州，求索革命真理，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8月，武元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广州起义。彼时，国民党大肆污蔑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武元博索性改名“洪水”，以此彰显对反动势力的蔑视。从那之后，洪水就跟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浪潮中奔腾向前，这个特别的名字也愈加为人所知。

洪水多才多艺，长期负责红军宣传、文教工作。在中央苏区时，他参与创办工农剧社，同时担任红军学校教员，还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因始终坚定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遭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批判，被开除党籍。在朱德、刘伯承的保护下，洪水得以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在行军途中负责宣传工作。红军到达遵义后，洪水受指派配合当地进步力量开展群众动员工作，为后续迎接中央首长入城、筹办群众大会、动员各界捐送物资作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后，洪水的处分被撤销，并恢复党籍。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洪水被编入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举动，洪水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因此被张国焘扣上“国际间谍”的罪名，列入捕杀名单。危急时刻，朱德、刘伯承巧妙周旋保护，洪水才免遭杀害，却再度被开除党籍。

在百丈关战役中，他所在的左路军接连遭遇重创，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洪水流落荒原。当他得知中央红军已顺利抵达陕北的消息后，下定决心独自向北，寻找党中央。他改换装束，一路依靠乞讨、放羊维持生存，孤身跋涉数千里。1936年初，衣衫破烂、骨瘦如柴的洪水终于抵达陕北，令见到他的战友们热泪盈眶。朱德见到洪水，十分高兴，对他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党中央随即撤销他身上的不实罪名，为他平反、恢复党籍。

全面抗战时期，洪水扎根晋察冀边区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培养抗日骨干。1945年，洪水归国，因战功卓著，1948年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1950年，洪水重返中国工作，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1956年，洪水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向党中央申请归国疗养。临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他。毛泽东叮嘱他：病好以后，我们还欢迎你回来。9月27日上午，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等200余名军队领导和老战友专程到车站为洪水送行，众人相拥告别。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河内病逝，年仅48岁。

萧克评价洪水是“中国人民的战友、国际主义的英豪”。洪水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越友谊的丰碑之上。